

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高等农林教育跨界融合

高耀

日前，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全面加强知农爱农教育、大力推进农林类紧缺专业人才培养等14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和不牢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面向新农业、新农民、新生态，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更好地支撑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是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意见》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农林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农林人才。但从现实来看，高等农林教育依然面临着许多发展困难和瓶颈。比如，传统农林学科发展与国家“三农”战略推进不协调不匹配，高等农林教育与行业、产业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服务农林新产业、新业态的学科专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高等农林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亟待提高，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面对我国农林业在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上发生的各种深刻变革，迫切需要以加快新农科建设为抓手，努力开辟我国高等农林教育跨界融合的新路。高等农林教育跨界融合的新路意味着各地各校要在统筹推进以内外循环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发展、产业协同发展为主要表征的新发展格局下，努力找准自身的“生态定位”，不断打破地域、产业、行业、部门等之间的分割，努力实现地域、产业、行业、部门等之间的跨界融合，不断营造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良好环境。

高等农林教育跨界融合的新路意味着各地各校需要统筹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一体化建设。在传统建设路径下，各地、各类行业特色型院校更倾向于以行业或特色结盟，而疏于和其他综合类院校或其他行业特色型院校跨界结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院校分割和行业分割的特征。各地农林类高校的跨界融合思路可由传统意义上的纵向跨界思维向新的立体跨界思维转变，立体跨界意味着可以向“前、后、左、右、上、下”等不同维度全面展开、一体化推进，毕竟高等农林院校不应也不可能独立和孤立的格局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

高等农林教育跨界融合的新路意味着各地各校需要不断打破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边界，不断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深度融合。前述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跨界融合，是为了从根本上促进不同学科及不同专业领域方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深度融合，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单纯依靠某一学科的力量无法对现代复杂社会作出有效解释和回应，更无法真正解决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各种新要求和新挑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农林院校从单一学科研究向多学科交叉融合跨界转变，从促进农林行业发展向促进以农林行业为主的其他相关行业发展转变。

面对新任务、新形势、新挑战和新问题，新农科建设和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要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努力实现跨界融合。各地的领头农林高校在跨界融合方面已经作出各类非常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期待高等农林教育的跨界融合继续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努力推进，不断助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和牢固的基础。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优化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

秦凤明

中小学全面推进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政策的重大部署，是增强教育服务能力、减轻家长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

目前，中小学“基础托管+素质拓展”的课后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受规模、师资、场地、设备等因素的限制，只能提供课后服务基础托管工作，特色课程的开设遭遇一定困境。有的小规模学校很少开展兴趣特长、体育锻炼、劳动体验等活动，出现“特色活动无特色”的尴尬局面。同时，教师由于在校时间延长、工作量增加，难以兼顾家庭等问题突出。不少农村中小学由于本校师资力量有限，无法满足学生及家长对课后服务高质量、多元化的要求。另外，不同于城市，农村小学生中有很多是祖辈骑三轮车接送。秋冬季节，课后延时服务结束时往往天色已黑，一些农村道路路况差，照明差，老人孩子的交通安全存在隐患。这些现实问题都应引起重视，学校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还要妥善化解困境。

充分挖掘优势资源，拓展特色课程供给。利用学校特有的资源优势，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设立符合教师专业背景、教学特长的项目，为有能力的教师开展课后服务创设条件和平台。加大教师培养力度，支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化培训，分层、分类、分岗开展校本培训。广泛动员科普、文艺、体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退役运动员、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以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赴农村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当地课后志愿服务平台的作用，组织城区优秀教师、第三方服务组织等，到农村小规模学校开展课后特色服务。引进优秀的在校大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实习岗位，加强高校与中小学之间的合作关系，缓解农村中小学特色资源供给的不足。

充实课后服务师资力量，优化师资队伍。适当提高中小师生比，加强优质师资供给，缓解教师日常教学工作负担重的问题。适当增加音体美劳专任教师编制总量，努力配足配优优艺专业类教师，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等活动创造条件。创新教师编制管理理念，积极构建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加强区域内教师资源流动，确保师资流动与生源变动相适应。通过合理调优缓解教师压力，推行弹性上下班制，支持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申请选择调休。

强化服务经费投入，提升保障能力水平。结合农村中小学实际，做好课后服务资金测算工作，对资金缺口要争取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充分发挥课后服务经费激励导向作用，构建科学、规范、合理的课后服务教师及工作人员薪酬分配机制。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制定相关保障政策，采取财政兜底与学生缴费相结合的方式，针对困难学生及低保家庭实施减免等倾斜政策，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加强课后安全管理，消除课后服务隐患。学校要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宣讲，提升学生和家的安全意识，自觉形成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保证出行安全。秋冬季后，农村学校可灵活调整下午上学放学时间，避免在天黑之后放学。

（作者系山西省壶关县教育局科员）



薛红伟 绘

► 热 评

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李名梁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召开，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代表参会。会议既探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也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现实需求和职业教育发展的“金砖方案”。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推动职业教育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国教育现代化全面提速，教育对外开放持续深入，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已成为教育交流的重要方向，职业教育国际化正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我国职业教育多年来的迅速发展，一直离不开对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比如融合德国经验，学校和企业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融合新加坡经验，注重教师的研发服务能力，注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在将这些国家的培养模式融会贯通后，我国职业教育不断在寻找和探索适应本土发展需求的新路径。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的客观需要，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尽管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已取得一定成效并积累了诸多办学经验，但整体来看仍处于起步阶段，在配套政策、管理方式、师资队伍、教学方法等方面仍需不断完善。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就要摒弃简单的线性逻辑，以系统思维为引导，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理念和模式。

上下联动合理谋划，做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承担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职能，尽快出台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专项规划，对职业教育国际化进行总体设计和统筹指导，明确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向、重点任务、推进策略、保障机制等。各职业院校应发挥主体作用，明确将职业教育国际化纳入学校战略规划予以通盘考虑，并根据具体校情和地方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特别是国家“双高”型院校，应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和模式的输出方面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主动肩负起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头雁作用。

主动对接国际标准，构建开放型国际化职业教育支撑体系。探索与中国企业和产品国际化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构建与国际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国际化师资队伍和信息交流平台。随着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课程体系需从传统的单一要素引转变为全面的标准对接，引进先进课程与国际证书，建立联动课程开发机制；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课程开发、设计与评价全过程，形成中外对接、产教融合的国际化课程和培训体系。积极承办各种国际职业教育大会、职业技能大赛等高水平国际赛事，加强与国际高水平职业教育机构和组织合作，开展学术研究、标准研制、师资交流，建设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性项目，全方位、深层次拓展人员、项目、机构等多维合作平台，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朋友圈”。

不断总结中国职教品牌，助力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规则的输出。在我国职业院校走出去的过程中，已涌现出包括天津“鲁班工坊”、浙江“丝路学院”、江苏“郑和计划”等多样化办学品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输出国际认可的标准和规则，才能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一方面，从政府到职业院校，都要形成打造职教国际化品牌的战略共识，用经营品牌的理念来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打造品牌提升我国在职教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跨国企业、海外教育机构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深度参与全球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证书认证标准、学历学位认定标准制定，推动职业院校积极加入国际教育互认体系。

（作者系伊犁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助大学毕业生城市落脚暖人心

夏熊飞

据《北京日报》报道，12月9日，平乐园大学毕业生公寓试点项目开始接待3年内毕业的大学生入住，为该群体提供330余间房源。今年6月，北京首批面向应届毕业生的4个保障性租赁房项目发布登记公告，朝阳区的平乐园项目是其中提供房源最多的一个。11月，北京多个保障性租赁房项目启动了第二批配租，配租对象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应届毕业生，近3年内毕业的大学生均可申请。

当前，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大城市推出了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保障性租赁房项目，配租对象也不仅限于应届毕业生，3—5年内的毕业生亦可申请，大大扩展了受益毕业生的范围。相较于市场上的出租房，这些保障性项目在价格、居住条件、租赁透明度上都有着明显优势，颇受广大毕业生青睐。这也从侧面说明，助大学毕业生圆城市“安居梦”不仅大有可为，而且更需大作为。

针对大学毕业生的保障性租赁房项目，虽然有不少城市在跟进，也很受市场欢迎，可毕竟投资额度大，收益显然也不如商业性楼盘开发。因此，就全国而言，推出类似项目的城市整体还是偏少，总的供给量依然很有限，还有大量毕业生只听闻过政策好但并未真正享受到实惠。

其实，这就涉及算眼前账与长远账的问题。政府部门主导的毕业生保障房项目，前期需要大量投资，后续可能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运营维护。殊不知，一座城市能否长期保持发展活力与后劲，关键在于能不能吸引并留住年轻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更是将来城市的消费主力之一，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城市立足，就是在为当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他们在初入社会期间感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温暖和关怀，对一座城市的好感度也会大大提高，建设发展这座城市的积极性也会更强。从长远来看，投资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明智之举。

其他尚未出台相关举措的城市可借鉴北京等地经验做法，在保障房、人才公寓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增加供给量，让更多大学毕业生摆脱找租房的后顾之忧。在提供保障房、人才公寓等项目时，还需要考虑到大学毕业生群体的特点，在运动、休闲、社交、教育等软件方面做好统筹安排，不仅要让他们有得住，更要住得好。此外，对相关的保障性政策也要广而告之，提高知晓度，并简化优化申请办理流程。在“扶上马送一程”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工作做得越细致，毕业生们的成才路就将走得越稳。

一个能助大学毕业生“安居梦”的城市，在打造人才高地上已处在领先地位，而且在口碑传播、媒介宣传、集聚效应等因素助推下，还将进入青年人才集聚越多的良性循环。助大学毕业生圆城市“安居梦”，其实是城市发展聚才蓄力，这只潜力股值得更多城市踊跃投资。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系列评论之四

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

吴砥

教育数字化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主题。综观世界各国教育数字化的推进过程，可以发现三条基本线索，即战略层面的规划、物质层面的升级、人的素养的提升。

我国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战略层面的规划引领，先后发布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为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了较完善的顶层设计，将教育数字化推上良性发展轨道。物质层面的升级也进展显著，网络、终端等各方面配置条件快速改善，构建了较好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支撑条件。2022年3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更是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全学段、全学科、全类型的优质资源全覆盖。

尽管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绩显著，但在人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层面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对疫情下大规模在线教学情况的调研发现，网络卡顿和部分教师对在线教学模式的不适应，仍是制约在线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师生数字素养测评显示，中小学生学习信息技术开展有效学习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强，其数字素养亟待提升。部分教师对于数字工具和资源的应用较为表面化，教学观念亟待转变，应用水平还需提高。

实际上，不管是战略层面的规划，还是物质层面的升级，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难点和重点还在于师生数字素养的提升。没有良好的数字素养，教师和学生就不能有效驾驭各种信息技术环境、平台、工具和资源，就难以以教与学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杠杆。教师数字化教学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可持续的专业发展、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的提升与数字化生存能力的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不仅是培养数字时代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因此，有必要深入思考师生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一方面，要完善多元协同的数字素养培育机制。数字素养培育同时受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因素影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依靠学校教师或信息技术课来完成培育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多元协同的培育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总体规划，落实信息科技国家课程，并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相关系列课程。高校研究人员应瞄准教育数字化发展前沿，协同相关企业开发涵盖教学、教研、管理的优质数字资源。中小学校则应结合实际办学情况和特色，探索开发种类丰富的数字素养校本课程，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合到学科课程中，并建立健全完善的家校共育机制，确保家长及时掌握学生数字素养的动态发展情况。校外科技场馆要多整合优质馆藏资源，探索开发适用于师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场馆课程及学习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数字素养教育活动。

另一方面，要开展多层次、多形态教师研训活动。教师研训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地方和区域层面应开展讲座、研讨、优质课展示、教学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活动，开设数字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线上、线下课程；应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跨校教研活动。学校层面要积极开展数字技术与教学整合的校内教研活动，助力教师队伍水平的整体提升。从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在一些地方的实施情况看，实践导向、面向课堂、依托真实教学场景的实战化培训，往往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此外，还要不断完善数据驱动